

欧阳修与杜衍的南都唱和析论

吕肖奂^{1,2}

(1.韩国外国语大学 中国研究学院,韩国 首尔 130791;2.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庆历新政后的七八年间,欧阳修连续四任州府长官,但到了后二任时,他才与当地官员、士人频繁唱和。尤其是到南都时期,他以知己、同道、门生、故吏、知府、诗友的多重身份,与致仕官员杜衍往复唱和并结集,创撰出两代官员之间唱和范例。欧杜南都唱和以及欧阳修对杜衍五老会唱和活动的支持与宣传,都成为宋代南都文学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为地方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欧阳修;杜衍;南都唱和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674(2014)06-0043-07

杜衍于庆历七年(1047)正月十三日,以太子少师致仕,退居南京(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直到嘉祐二年(1057)二月去世。皇祐二年(1050)七月一日欧阳修改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当月二十四日到任,皇祐四年(1052)三月十七日,其母郑氏卒于官舍,欧阳修归颖守制。在应天府不到两年时间,欧阳修常常拜谒杜衍,并与杜衍屡有诗歌唱和。杜衍去世后,欧阳修编辑二人“南都时唱和诗为一卷”^①,以示纪念。

欧、杜南都唱和诗一卷的具体情况如何,已经不得而知。目前可见的是《居士集》卷十二《纪德陈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二首》下注:“一云《与丞相太傅杜公唱和一十二首》,自此而下。”^②这十二首律诗可能并非欧阳修唱和诗全部,至少《居士外集》还有一首是欧阳修在南都所作^③;杜衍因为诗集没有保存,所存更少,除了五老会一首首唱以及评议聚星堂咏雪

诗两首外,其他唱诗与和诗都不可见^④,仅能据欧阳修存诗的题目和内容去推想,因而本文的探析以欧阳修为主。

一、欧阳修作为州府一级最高长官的唱和历程

庆历五年(1045)新政失败后到皇祐四年(1052)的七八年间,欧阳修连续外任,从滁州到扬州到颍州,再到南都,是欧阳修人生仕途再次受到重大打击后的疗伤时期,也是他历任地方长官、作为一方大员的历练成熟期。在此之前,欧阳修也曾到洛阳、汴京、夷陵、河北路任职,但均非州府级最高长官,因此此回多地外任对欧阳修而言,不仅是他个人仕途政治的一种新体验,而且也是他与地方官员士人沟通协调和支持、建设、促进地方文教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机。

庆历五年(1045)八月二十一日,欧阳修罢都转运按察使,以知制造出知滁州,十月二十二日至郡。

① 南都唱和十二首诗,见《欧阳修全集》83-85页,中国书店1986年据世界书局1936年版影印。下引《欧阳修全集》,除特殊标明外,均采用此版本。

② 《居士外集》卷六《太傅相公入陪大祀,以疾不行,圣恩优贤,诏书俞允,发于感遇,纪以嘉篇,小子不揆,辄亦课成拙恶诗一首》。见《欧阳修全集》393页。

③ 杜衍诗,参见《全宋诗》卷一四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二版,第1596-1602页。

【收稿日期】2014-09-20

【基金项目】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Research Fund.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唱和诗歌文化研究”(编号:11BZW048)

【作者简介】吕肖奂(1965—),女,河南灵宝人,韩国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宋代文学。

初到任上,欧阳修心有余悸,曾戒苏舜钦作诗^①,但他在滁州三年却创作不断,且与旧友如苏舜钦、梅尧臣、富弼、曾巩等人唱和不绝,其《醉翁亭记》《丰乐亭记》诸文更令滁州声名大振。欧阳修与当地士民也常常游宴,但其游宴内容基本是如《醉翁亭记》所云“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并无诗歌唱和。这大概是因为滁州荒远偏僻,人才稀缺,能与欧阳修唱和的士人太少,正像《醉翁亭记》所谓“人知从太守游而乐,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欧阳修因而只能独吟或与外地旧游酬唱以排遣内心郁闷。他与滁州官员士人的唱和鲜有所闻,唯有《谢判官幽谷种花》谈到梅尧臣的内弟、谢绛的堂侄谢缜。谢缜是欧阳修的下属,加上梅尧臣、谢绛的关系,应该与欧阳修有很多唱和,但现存却寥寥无几^②。欧阳修在滁州任上似乎没有遇到强劲的“诗敌”。

庆历八年(1048)二月欧阳修离开滁州,二十二日到扬州任上。虽然仍是知州,但扬州的经济历史文化水平、地位远高于滁州,因而移知扬州算是一种升迁。欧阳修到扬州后写信给杜衍、韩琦,决心效法他们,做一个勤政爱民的知州,《与杜正献公》其一写得尤其情真意切:

扬古名都,尝多巨公临治。忆为进士时,从故胥公自南还,舟次郡下,游里市中,但见郡人称颂太守之政,爱之如父母,某时尚未登公之门,然始闻公之盛德矣,因窃叹慕不已,以为君子为政,使人爱之如此,足矣。然不知公以何道而能使人如此,又不知使己他日为之,亦能使人如此否?是时天圣六年冬也,去今几二十年,而幸得继公为政于此,以偿夙昔叹慕之心,而其材薄力劣,复何能为?徒有志尔。相公道德材业著于天下,一郡之政不足多述,因小生之幸,遂以及之。

欧阳修少年时期,杜衍就已经是他的榜样了。然而他在扬州不满一年,却因“目疾”自请颍州^③,深究其背后原因,大概是《与韩忠献王》其七所云:“疏简之性,久习安闲,当此孔道,动须勉强。……巍巍之才,已难开展,又值罢绝回易,诸事裁损,日忧不济,此尤苦尔。”书信中自然有自谦成分,但剧郡不易治理却也是实情。

然而尽管有多种困难,欧阳修在平山堂暑饮却

传为“故事”,令后来者向往不已:“欧阳文忠公在扬州作平山堂,壮丽为淮南第一,堂据蜀冈,下临江南数百里,真、润、金陵三州隐隐若可见。公每暑时,辄凌晨携客往游,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余朵,以画盆分插,百许盆与客相间,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往往侵夜载月而归。……迩来几四十年,念之犹在目。今余小池,植莲虽不多,来岁花开,当与山中一二客修此故事。”^④只是这种雅饮也像在滁州游乐一样,没有留下什么唱和诗。倒是庆历八年(1048)中秋前后,梅尧臣归乡时途经扬州,欧阳修为之举办赏月会,邀请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许元作陪,才算是与同时同地任职的官员有些酬唱,据梅尧臣《依韵和发运许主客咏影》《寄酬发运许主客》等诗题看,许元能诗多诗,但在欧阳修看来,以许元的创作水平,就是与自己联合起来,也得事先做好充分准备才能抵挡梅尧臣,所谓“仍约多为诗准备,共防梅老敌难当”(《招许主客》)。梅尧臣《依韵和欧阳永叔中秋邀许发运》则客气地回答“曾非恶少休防准,众寡而今不易当”。欧阳修与许元的唱和没有太多留存,欧在扬州的唱和也仅此而已。

皇祐元年(1049)正月十三日欧阳修移知颍州。欧阳修《思颖诗后序》云:“皇祐元年春,予自广陵得请来颖,爱其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于时慨然已有终焉之意也。”除了颍州的民风水土,“颖虽陋邦文士众”(欧阳修《雪》)也应是欧阳修留恋颍州的重要原因。欧阳修知颍州期间,不仅下属吕公著通判、张器判官能与他唱和^⑤,在颍州丁父忧的刘敞、刘攽兄弟也成为他的讲学唱和友,加上欧之弟子魏广、徐无党,还有几位处士如焦千之、常秩、王回,让欧阳修看到当地士子的风貌,欧阳修在颍州才感受到了身为地方长官的最大乐趣:仅仅游乐畅饮是不够的,宴饮中能够诗歌唱和,才更优雅有品味。他们多次宴集于聚星堂分韵分题赋诗,用文学上的交流与沟通代替普通的吃喝玩乐:

欧公居颖上,申公吕晦叔作太守(应为通判)。聚星堂燕集,赋诗分韵,公得松字,申公得雪字,刘原父得风字,魏广得春字,焦千之得石字,王回得酒字,徐无逸得寒字;又赋室中物,公得鸛鵒螺杯,申公得瘦壶,刘原父得张越琴,魏广得澄心堂纸,焦千之得金星研,王回得方竹杖,徐无逸得月砚屏风;又赋席

① 苏舜钦《和永叔琅琊山庶子泉阳冰石篆诗》自注,《苏舜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欧阳修的外任经历,详参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② 欧阳修到扬州后有《答谢判官独游幽谷》,可知谢缜有赠诗,但谢缜诗无存。

③ 详参欧阳修《与韩忠献王》其八、《与章伯镇》其四。

④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丛书集成本。

⑤ 欧阳修有《答吕公著见赠》《答吕太博赏莲》《酬张器判官泛溪》等诗。

间果,公得橄榄,申公得红蕉子,刘原父得温柑,魏广得凤栖,焦千之得金橘,王回得荔枝,徐无逸得杨梅;又赋壁间画像,公得杜甫,申公得李文饶,刘原父得韩退之,魏广得谢安石,焦千之得诸葛孔明,王回得李白,徐无逸得魏郑公。诗编成一集,流行于世。当时四方能文之士及馆阁诸公,皆以不与此会为恨。^①

七人经常分题分韵作诗,结成诗集流行,可谓诗坛雅事,引领当时地方唱和风骚。

除了分题分韵外,欧阳修还制订出“禁体物语”这一新颖的咏物唱和标准,其《雪》诗下注云:“时在颍州作。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事,皆请勿用”,简短说明了当时咏雪的禁令规则。诗中所云“颖虽陋邦文士众,巨笔人人把矛槊。自非我为发其端,冻口何由开一噤”,可见欧阳修对颍州“文士”的了解程度,以及他自己自觉的“发端”创新意识。

尽管欧阳修知颍州只有一年半左右,但颍州唱和为欧阳修赢得了更大的郡守文采风流声名,这位“文章太守”终于在颍州找到了类似当年西京“七老”交游唱和的乐趣。而正当他乐此不疲与下属、处士、弟子唱和时,却接到了知应天府的任命。

欧阳修在南京任上政务、俗务、人事十分繁忙,正如欧阳发《先公事迹》所云:“南京素号要会,宾客往来无虚日,一失迎候,则议论锋起。先公在南京,虽贵臣权要,过者待之如一。由是造为语言,达于朝廷。时陈丞相升之安抚京东,因令审察是非,陈公阴访之民间,得俚语谓公为‘照天蜡烛’,还而奏之。”^②然而他并没有放弃颍州时期高涨的唱和雅兴,何况他遇到的是杜衍以及其他致仕闲居官员,一群年龄身份均与颍州唱和圈截然不同的唱和对象。

杜衍对欧阳修诸人的颍州唱和早有耳闻,他多次向欧阳修索读聚星堂诗^③,并对其咏雪“白战体”给予很高评价:

聚星堂咏雪,约云“‘玉月梨花练絮白舞鹅鹤’等事,皆请勿用”。杜祁公览之嗟赏,作诗赠欧公云:“尝闻作者善评议,咏雪言白匪精思。及窥古人今人诗,未能一一去其类。不将柳絮比轻扬,即把梅花作形似。或夸琼树斗玲珑,或取瑶台造嘉致。散盐舞鹤实有徒,吮墨含毫不能既。深悼无人可践言,一旦见君何卓异。”又云:“万状驱从物外来,终篇不涉题中意。宜乎众目诗之豪,便合登坛推作帅。回头且

报郢中人,从此阳春不为贵。”祁公耆德硕望,欧公为文章宗师,祁公礼所宜厚,然前辈此风,类多有之。所可叹息者,后来无继耳。^④

杜衍因此而将颍州唱和与南都唱和连接在一起。杜衍的诗歌应该是对欧阳修“禁体物语”创作的最早评价。

欧阳修对杜衍如此高度的评价十分感激乃至惶恐,因为在此之前这位年长欧阳修三十岁的师长与上司,重视的是欧阳修的政事吏治才能,而很少关注欧阳修的诗歌创作。欧阳修南都唱和十二首诗中,有两首可能就是酬答此二诗^⑤的:《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诗谨成》云:“楚肆固知难炫玉,孔门安敢辄论诗。藏之什袭真无用,报以双金岂所宜。已恨语言多猥冗,况因杯杓正淋漓。愿投几格资哈噱,欲展须于欲睡时”;《和太傅杜相公宠示之作》又云:“平生孤拙荷公知,敢向公前自炫诗。忧患飘流诚已甚,文辞衰落固其宜。非高仅比巴音下,少味还同鲁酒漓。两辱嘉篇永为宝,岂惟荣耀诧当时。”在欧阳修的谦卑中,是对知音杜衍的无比崇敬。长辈的赏识与晚辈的谦逊是欧杜南都唱和互动的基础。

地方唱和需要很多条件,譬如地方长官是否热爱交游与文学创作、具备多高的创作素质,其副贰僚属是否同样具备文学素质、能否与之相处融洽,而更重要的是本地文化教育水平、有无能酬唱无碍的地方“名胜”、士子的向学程度以及是否热衷于创作,等等。欧阳修自景祐起就已经是政坛文坛耀眼的明星,经历了庆历新政,他的政治文学声誉如日中天,他的外任几乎意味着将文坛中心由汴京向地方的转移,而滁州、扬州、颍州、南都不同的地域文化尤其是当地当时的人物,给他提供了最为直接又有些偶然的对话沟通语境。离开颍州年轻一辈构成的融洽又充满朝气的唱和圈,欧阳修面对长辈旧交以新的角色在南都开始了新的唱和。

二、多重身份下各种情感凝聚的唱和诗

面对旧知杜衍,欧阳修有多重身份。欧阳修《纪德陈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二首》其二云“昔日青衫遇知己,今来白首再升堂”,他后来的《跋杜祁公书》一段话可以说是对此诗句意的详细注解:“公当景祐中为御史中丞,时余以镇南军掌书记为馆阁校勘,始登公门,遂见知奖。后十五年,余以尚书礼部郎中、龙

① 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宝颜堂秘笈本。

② 据欧阳修《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诗谨成》下注“一本云:‘太傅相公宠答佳篇,仍索拙诗副本,谨吟成四韵以叙鄙怀’”,可知杜衍评价过聚星堂诗后,还索要其诗副本。南都唱和十二首诗题下均有“一本云”,所云当为唱和时最初题目,入集时改拟成简短诗题。

③ 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宝颜堂秘笈本。

④ 《全宋诗》1600页将此书所引二诗合为一首,题作《聚星堂咏雪赠欧公》。

图阁直学士留守南都,公已罢相致仕于家者数年矣。”很难详知杜衍景祐中如何“知奖”欧阳修,而欧阳修从此以后就将杜衍当作平生第一知己。贬谪滁州时,欧阳修《与杜正献公》就有“不惟上孤陶钧,实亦惭愧知己”之语;移知颍州,欧阳修表达了“蕞尔小子,蒙德有年,瞻望门墙,何日而已”这样的感恩向往之情;留守南都,给欧阳修提供了瞻望知己门墙的机会,所以他不断登门拜谒求教唱和。杜衍嘉祐二年初去世后,欧阳修的这种感情更加强烈,他主动且谨慎地斟酌杜衍的墓志铭,并多次与杜衍次子杜沂谈论他的想法,《与杜沂论祁公墓志书》其一云:“平生知己,先相公最深,别无报答,只有文字是本职,固不辞,虽足下不见命,亦自当作。然须慎重,要传久远,不斗速也。”其二云:“修愚鄙,辱正献公知遇,不比他人。公之知人推奖,未有若修之勤者;修遇知己,未有若公知之深也。其论报之分,他事皆云非公所欲,惟纪述盛德,可以尽门生故吏之分。然以衰病,文字不工,不能次序万分之一,此尤为愧恨也。”这种历久弥新的知己之感,使得欧阳修那些看似平淡的诗句充满了感激之情与知恩图报之意。

欧阳修《答太傅相公见赠长韵》“凋零莺谷友”一句下注:“修与尹师鲁、苏子美同出门下。”因此他一直自称门生,对杜衍敬仰有加。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八云:“欧公与尹师鲁、苏子美俱出杜祁公之门。欧公虽贵,犹不替门生之礼。和祁公诗云:‘麈尾屡挥容请益,龙门虽峻许先登。立朝行已师资久,宁止篇章此伏膺。’又云:‘公斋每偷暇,师席屡攻坚。善海常无倦,余谈亦可编。’又云:‘昔日青衫遇如已,今来白首再升堂。’盖未尝一日忘祁公也。”从中可以看出对欧阳修终身不改门生之礼十分看重。

作为门生,欧阳修将杜衍视为处理政事的导师,他徙知扬州时就表达过效仿杜衍之意,在南都期间更是经常登门求教,所谓“铃斋幸得亲师席,东向时容问治民”。他还详细描述了登门请益的情状,在“善海常无倦,余谈亦可编”下自注云:“每接公论议,皆立朝行己之节,至于谈笑之节,亦多记朝廷故事,皆可纪录,以贻后生。”向杜衍虚心求教使得“仰高虽莫及,希骥岂非贤”这样的话看起来并非虚语。欧阳修还将杜衍视为人生导师,尊重其为人行事:“俭节清名世绝伦,坐令风俗可还淳”,“凛凛节奇霜涧柏,昭昭心莹玉壶冰。正身尚可清风俗,当暑何须厌郁蒸。”这些看似陈词滥调的溢美之词,其实有很多

事实支撑,欧阳修的《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云:“公自布衣至为相,衣服饮食无所加,虽妻子亦有常节。家故饶财,诸父分产,公以所得悉与昆弟之贫者,俸禄所入,分给宗族,赈人急难,至其归老,无屋以居,寓于南京驿舍者久之。……凡公所以行之终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为人之所难,而公自谓不足以名后世,遗戒子孙,无得纪述。”杜衍《新居感咏》云:“始营菟裘地,来向濉水湄。城隅最穷僻,匠者宁求奇。卜筑悉由己,轩牖亦随宜。外以蔽风雨,内以安妻儿。燕雀莫群噪,鸛鹤才一枝。因念古圣贤,名为千古垂。何尝广居室,俭为后人师。”可以视作欧阳修诗文的补充。

欧阳修与杜衍还是庆历新政的“朋党”。庆历五年(1045)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富弼罢职外任,二十九日,杜衍罢知兖州,欧阳修三月上《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①,辨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朋党”之诬而无果,却被视为四人的“朋党”。杜衍不久就从兖州任上致仕,也是无奈之举。庆历新政中,杜衍的所作所为,参与其中的谏官欧阳修知之甚深,感之尤切^②,失败之后两人都有被贬谪外任的经历,因而更有同道同情之理解,所以欧阳修在诗歌中称杜衍是“貌先年老因忧国,事与心违始乞身”,“事国一心勤以瘁,……风波已出凭忠信,松柏难凋耐雪霜”。杜衍对这些诗句十分欣赏,据《石林诗话》记载:“杜正献公自少清羸,若不胜衣,年过四十须发即尽白。虽立朝孤峻,凛然不可屈,而不为奇节危行,雍容持守。不以有所不为为贤,而以得其所为为幸。欧阳文忠公素出其门,公谢事居宋,文忠适来为守,相与欢甚。公不甚饮酒,唯赋诗唱酬,是时年已八十,然忧国之意,犹慷慨不已,每见于色。欧公尝和公诗,有云‘貌先年老因忧国,事与心违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常自讽诵。当时以谓不惟曲尽公志,虽其形貌,亦在模写中也。”

苏舜钦是杜衍的长女婿,与欧阳修同出杜衍门下,又是欧阳修的同道诗友,更是庆历新政的支持者。庆历四年(1044)十一月七日,进奏院事发,欧感叹不能相救;庆历八年(1048)苏舜钦去世,欧阳修深切悼念;皇祐元年(1049)欧阳修《与杜正献公》云:“顷自去冬子美之逝,贤人不幸,天下所哀,伏计台慈倍深痛悼。”唱和诗中更有“凋零莺谷友,憔悴雁池边”的叹息。皇祐三年(1051),欧阳修于杜衍处得苏舜钦遗稿,编成文集十卷且作序^③。这层关系无疑也

① 题目下注:一作《上皇帝辨杜韩范富书》,庆历五年。《欧阳修全集》846页。

② 详参欧阳修《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

③ 欧阳修《苏氏文集序》:“予友苏子美之亡后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遗稿于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录之,以为十五卷。子美,杜氏婿也,遂以其集归之。而告于公曰……”《欧阳修全集》287页。

加深了欧杜感情。

作为知府大尹,欧阳修对杜衍这位身份特殊的“治下之民”,不仅“岁时率僚属候问起居”(《跋杜祁公书》),而且举办“庆老公宴”(详见下文)以示尊崇。欧阳修拜谒杜衍时,常常会在仪仗簇拥下浩浩荡荡光临杜府,这种炫耀式的排场是为了显示对杜衍的尊敬,也是为了以门生的成就加强导师的荣光,所谓“里门每入从千骑,宾主俱荣道路光”。欧阳修有着普通官僚对荣宠的世俗看法,譬如杜衍退居南都期间,仁宗祀明堂,多次诏请他入京陪祭,欧阳修认为这是莫大的荣誉,但杜衍却因疾病而辞行,欧阳修诗云:“驿骑频来急诏随,都人相与窃嗟咨。自非峻节终无改,安得清衷久益思。前席盖将求谏议,在庭非为乏陪祠。尊贤优老朝家美,他日安车召未迟。”^①他在《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的序与铭中也提到此事:“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将有所问,以疾不至,而岁时存问,劳赐不绝。……奕奕明堂,万邦从祀。岂无臣工,为予执法。何以召之,惟公旧德。公不能来,予其往锡。”这是他“千骑拥高牙”拜谒杜衍的心理依据。

杜衍作为欧阳修的“治下之民”,曾作“喜雨”诗(今不存)盛赞欧阳修的为政有方,欧阳修《依韵和杜相公喜雨之什》云:“岁时丰俭若循环,天幸非由拙政然。一雨虽知为美泽,三登犹未补凶年”,且自注:“京东累岁不熟”,表现出一个知府谦逊且忧民的情怀。

欧阳修还将杜衍视作最为强劲的“诗敌”,其《依韵答相公宠示之作》有“平生未省降诗敌”之语,下注云“近数和难韵,甚觉牵强”,表示对杜衍唱诗的降服。南都唱和中的欧阳修十分谦卑,不仅在《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诗谨成》《和太傅杜相公宠示之作》二诗中自谦,而且在《答杜相公惠诗》称赞杜衍的唱诗:“言无俗韵精而劲,笔有神锋老更奇。”虽说此语不免虚美,但这无疑鼓励杜衍创作的热情。欧阳修还称赞杜衍兼擅“事业”与“篇章”:“元刘事业时无取,姚宋篇章世不知。二美惟公所兼有,后生何者欲攀追。”颍州时期知州主导型唱和变作南都时期上下级逆动型唱和。

欧阳修在南都唱和中,兼具知己、同道、门生、故吏、知府、诗友多重身份,每种身份都增加一份情感:理解、尊敬、钦佩、谦逊、感恩、荣耀等叠加累积,凝结成十多首唱和诗厚重的内涵。今人看来不过是泛泛应酬的唱和,如果挖掘出唱和双方的交往相处历史,还原到当事人唱和的语境,很难说完全是虚与委蛇

的无聊之作。

三、五老会唱和:南都文学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作为宋四京之一的南京,历史上或称宋州或称睢阳,至道中(995-997)属于京东路,景德三年(1006)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才升为南京。四京之中,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的水平与地位,远不及东都汴京、西都洛阳,只是比庆历二年(1042)才升格为北京的大名府略强一些。刘攽《送欧阳永叔留守南都》以渊博的学识与古雅的语汇描述了欧阳修赴南都时的排场以及南都的政治文化历史状况:

白水帝旧里,大火天明堂。王都异丰镐,原庙崇高光。毕命继三后,商邑正四方。保厘自古贵,金日朝论昌。前旌鸟隼旂,左佩麒麟章。阨途乱铙吹,先路交壶浆。风物盛山东,令人忆游梁。缅然严邹徒,赋笔尝慨慷。废池扫清冷,旧苑开荒凉。终留相如坐,一伴鳧雁翔。^①

然而西汉梁孝王时期的梁园风流后世难继,直到欧阳修、杜衍唱和之前,南都的文学文化发展乏善可陈。

王仲勇《南都赋》铺叙了南都在宋初创建的原因与过程:

夫大宋之开基也,肇自商丘,大启土宇。创洪图而遗亿代,一帝统而超邃古。万国被德泽,四裔畅皇武。西荡巴蜀,东澹海濬,北指幽蓟,南曜朱垠。天乙七十里而兴王,姬周三十世而卜宅,曾何足云?至于祥符之际,累盛而重熙。增太山之高,禅梁父之基。神祇安妥,日星光辉。宝符瑞应,萃乎斯时。于是巡方,幸亳社,动天辂,备法驾。海夷献珍,黄云覆野。就见百年,存问鰥寡。明堂法度,赦宥天下。当是时也,翠华回驭,龙旆载扬,乃睠兹土,如归故乡。观紫气于芒山,辨白水于南阳,洒翔鸾之神翰,挹鸿藻之天章。于是建南京,陪上国,首诸夏,作民极。对列乎浚郊,相辉乎洛宅。^②

在帝王诏命下创建一个陪都不需要太多时间,但是一个都市的文化文学发展却尚需更多的时间和人物。

杜衍于庆历七年(1047)退居南京时已是古稀之年。作为官员、政治家,杜衍致仕之前致力于政事政务,并无多少诗歌创作与唱和,而退居南都之后,他曾与苏颂谈到“吾常见世之学文者为吏而或不事事,言吏政者又有脱略细故而不为文”^③,认为二者应该兼擅;他还深感此生最大的遗憾是“独无风雅可流传”,所以开始留意“风雅”之事,积极创作唱和。欧

① 刘攽《彭城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苏颂《谢太傅杜相公》,《苏魏公文集》卷六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同)。

阳修安慰他说“南都已见成新集”^①,他还将编写的诗集寄给文彦博,文彦博称赞他“一轴诗三十,词高气格雄”^②。他现存诗歌不多,但基本上是退居南都十年所作。

杜衍退居南都十年,不仅创作意识觉醒,而且还产生了自觉建设地方文化的意识。应天府升作南都后,成了一些致仕官员选择的安度晚年之地,这为五老会的形成提供了条件。杜衍“与宾客太原王公(涣)、故卫尉河东毕卿(世长)、兵部沛国朱公(贯)、驾部始平冯公(平),咸以耆年挂冠,优游乡梓,暇日宴集,为五老会,赋诗酬唱,怡然相得。宋人形于绘事,以纪其盛。”^③在五老会中,杜衍虽然年纪最小,却因在庆历中曾居相位而被视为五老会的中心人物,钱明逸《睢阳五老图诗并序》将杜衍放在五老之首:“今致政官师相国杜公,雅度敏识,圭璋岩庙,清德令望,龟准当世。功成自引,得谢君门,视所难得者则安享之,谓所难行者则恬居之,燕申睢阳。”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五亦云:“祁公以故相耆德,尤为天下倾慕。”杜衍退居较其他四人晚,他可能是五老会的组织者。杜衍题五老会画像诗中有“若也睢阳为故事,何妨列向画图看”之语,透露出他试图将五老会发展成南都文化标志的愿望。

五老会之前,南京并无太多声名远播的文学活动,五老会的成员颇有效仿洛阳白居易九老会,希望南都也像西京一样文采风流的意图,朱贯诗云“九老且无元老贵,莫将西洛一般看”,指出五老中因为有杜衍这样的“元老”,其规格自然比洛阳九老更高,以证明南都五老会后来居上。

欧阳修著述创作意识以及发展地方文化的意识比杜衍更早期且更强,所以他皇祐二年(1050)七月到南都任职不久,就为五老举办“庆老公宴”。时为南京留守推官的苏颂记载:“某顷为南都从事,值故相

杜公与王宾客涣、毕大卿世长、朱兵部贯、冯郎中平同时退居府中,作‘五老会’。一日大尹庐陵欧阳公作庆老公宴,而王、毕二公以病不赴,中座亦只四人,某时与诸僚同与席末。”^④欧阳修作为地方最高长官,敬老尊老,对五老会活动十分支持,这种府宴有促进五老会发展的作用。

欧阳修借阅了五老会唱和诗并写《借观五老诗次韵为谢》:

脱遗轩冕就安闲,笑傲丘园纵倒冠。白发忧民虽种种,丹心许国尚桓桓。冥鸿得路高难慕,松老无风韵自寒。闻说优游多倡和,新篇何惜尽传看。

由此可知欧阳修是五老会唱和诗的最早阅读者和宣传者,五老会活动及唱和诗因为有了他的支持、追和与盛赞而流播四方。

欧、杜及五老会在南都唱和活动的见证人与直接受益者是后学苏颂(1020-1101)。苏颂作为后生晚辈,对欧阳修、杜衍的仰慕感激溢于言表,他在南都与欧、杜也有唱和^⑤。他后来谈到欧阳修,就会回忆起“早向春闱遇品题,继从留幕被恩知”^⑥的两段经历;谈到杜衍,就会想到“几杖初来宅次睢,孤生从此被深知。翹材馆盛亲师益,绿野堂闲奉燕私”^⑦的情状。南都“庆老公宴”后五十年,苏颂已经年届八十,在一次宴会上,他“言念往昔,正类今辰”,仍对当日情形以及人物念念不忘:“曾览祁公五老诗,仍陪三寿燕留司。今逢北固开尊日,正似南都命席时。喜奉笑言挥麈柄,却惭衰朽倚琼枝。定知此会人间少,五十年才一再期。”^⑧这种难得的“故事”,已经深入到后生晚辈的记忆中,延伸到北宋后期。

皇祐四年(1052)去世的范仲淹、至和二年(1055)去世的晏殊,均有次韵赓和五老会诗,范诗有云“道似皋陶垂德惠,政如傅说起圭桓”,晏诗有云“百日秉枢登相府,千年青史表旌桓”^⑨,二人都曾与

① 欧阳修《太傅杜相公有答兖州待制之句,其卒章云“独无风雅可流传”,因辄成》。

② 文彦博《潞公文集》卷四《谢太傅杜相公以近诗三十首寄示》:“一轴诗三十,词高气格雄。文通推杂体,吉甫让清风。平日丹青笔,当年造化工。安车有余力,移向二南中。”

③ 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四十五、钱明逸《睢阳五老图诗并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苏魏公文集》卷十二《润守修撰见招,与左丞王公、大夫俞公东园集会,宾主四人,更无他客。……言念往昔,正类今辰。然自皇祐庚寅(1050)迄今元符己卯(1099),整五十年矣。抚事感怀,辄成七言四韵》。

⑤ 如《府尹欧阳公以临书智信篇为贶,谨以长句酬谢》《谢太傅杜相公惠吴柑》《太傅相公以梅圣俞寄和建茶诗垂示,俾次前韵》等,均见《苏魏公文集》卷六。

⑥ 《苏魏公文集》卷十四挽辞《欧阳文忠公二首》其二。

⑦ 《苏魏公文集》卷十四挽辞《司徒侍中杜正献公五首》其五。

⑧ 《苏魏公文集》卷十二。

⑨ 范仲淹、晏殊和诗证明现存五老会诗是皇祐四年前作品,并非至和三年钱明逸作序时才唱和,五人创作时的岁数也并非钱序所标注的年龄。现存五老会五首诗可能是欧阳修在南都任职时期五老所作。明赵琦美《赵氏铁网珊瑚》卷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该书收录了大量的睢阳五老图题画诗,后来的画谱类书都沿袭收录并累代增加。下文所列唱和追和题跋名单也见于此书。

杜衍共事,对杜衍都有深入的了解。他们应该是从杜衍处了解到五老会诗。晏诗结句云“逍遥唱和多高致,仪像霜风俾后看”,也指出杜衍的行为故事将会流传久远。

后任南都知府的钱明逸于至和三年即嘉祐元年(1056)中秋,从杜衍处得观南都人为五老的画像以及唱和诗而作的《睢阳五老图诗并序》,是对前此的唱和活动的总结:“昔唐白乐天居洛阳,为九老会,于今图识相传,以为胜事。距兹数百载,无能绍者。以今况昔,则休烈巨美过之。明逸游公之门久矣,以乡闾世契,倍厚常品,今假手留钥,日登翹馆,因得图像,占述序引,以代乡校咏谣之万一。”也将五老会视作南都文化兴盛的标志性事件。

此后,五老会诗的次韵和者与追和者尚有:张商英、富弼、韩琦、胡瑗、苏颂、邵雍、文彦博、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苏轼、黄庭坚、苏辙、范纯仁等十五人,几乎涵盖北宋中后期的儒林文苑政坛名流。而南宋绍兴以后为五老会画像诗歌题跋者有蒋璨、杜

绶、钱端礼、胡安国、朱熹、吕祖谦、王铨、季南寿、谢觐、洪迈、张贵谟、游彦明、范成大、欧阳希逊、谢如晦、俞端礼、何异、朱子荣(他从毕氏家族换得绘画及题诗)等十八人,其中既有五老、钱明逸之后代子孙如杜绶、钱端礼、朱子荣,又有硕儒名臣名士。元明清的题跋也源源不断。画像以及大量的唱和、追和、题跋,将睢阳五老故事流传久远,变成睢阳的文化与文学典故,久盛不衰。

[参考文献]

- [1] 欧阳修.跋杜祁公书[M]//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据世界书局1936年版影印),1986:537.
- [2] 欧阳发.先公事迹[M]//欧阳修.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五.北京:中国书店(据世界书局1936年版影印),1986:1369.
- [3] 欧阳修.居士外集:卷六[M]//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据世界书局1936年版影印),1986:393.
- [4] 吕祖谦.宋文鉴: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1992:122.

[责任编辑 孙艳红]

An Analytic Study of Responsorials Between Ouyang Xiu and Du Yan in South Capital

LV Xiao-huan^{1,2}

- (1.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eoul 130791, South Korea;
2. Institute for Non-orthodox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seven or eight years after Qingli reform, Ouyang Xiu undertook four consecutive tenures as the prefectural magistracy. However, only during the latter two magistracy tenures did he frequently improvised responsorial poems with local officials and scholars. As a bosom friend, fellow, disciple, magistrate and poetry pal, Ouyang Xiu repetively made resposerials with Du Yan, an retired prefectural magistracy during his stay in the South Capital. They also issued these poems. What they did set a paradigm of cross-generation officals' poetry responsorials. Ouyang's responsorials with Du Yan in South Capital and his support and popularizing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Five Honestly-Retired Officals were the landmark event of the rise of the South Capital literature in Song dynasty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re.

[Key words] Ouyang Xiu; Du Yan; responsorials in the South Capital